

季羨林的敦煌学研究贡献略论^{*}

齐皓 张俏梅

(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美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 要:季羨林先生和敦煌学结有不解之缘,可以说对敦煌文化的研究是季老毕生研究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季老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的理论、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编撰研究文献、留下散文杂记等方面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关键词:季羨林;敦煌学;研究;贡献;文化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Master Ji Xianlin's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Dunhuang Study

QI Hao, ZHANG Qiao - mei

一、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

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献,理所当然地成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国内学人把敦煌学看作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奋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学领域里打个翻身仗。显然,敦煌学的范围极其广泛,我们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阗语、粟特语、藏语文献方面,都和国际学术水准相距甚远,而国内庞大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中,仍然有许多人固守那些汉文世俗文书,炒冷饭,使得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正在日益走进困境。

所以,一直以来就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回归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之类的话,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虽然也有一定内涵,但是不够开通,积极意义不足,以至于学术界往往会有些无谓的争议。在 1988 年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的讲话中,季羨林先生则首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种看法获得国内敦煌学人的认同,一下子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解疙瘩,凝

聚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力量。但要真正去体认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不妨读一读季先生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语言障碍,用国际通行的英文,解读“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文献,在向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域古代语言文字中心的德国出版这本专著,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季老高瞻远瞩的见识,博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他的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做老大,不可能做“敦煌学中心”。从此,敦煌学突破了狭隘的研究思潮,对加强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敦煌学研究从此由各自地域性狭隘研究变成世界性合作研究的一门显学。

二、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的理论

季羨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一体、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 作者简介:齐皓(1971-),男,汉,安徽安庆人,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陶瓷美术。

张俏梅(1972-),女,汉,安徽安庆人,文学(艺术学)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艺术。

季老的论断对于回答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据以认定:敦煌文化并不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专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是专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敦煌文化所在地敦煌地区虽然也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明显表现,但这里的文化内部构成并不同于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中心的西域,而是中原传统文化及其体系始终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季羨林先生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对敦煌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

三、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

自从1983年开始,季先生就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除了在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推动敦煌学的健康发展之外,季先生还身体力行,推进敦煌绘画和文献的保护,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加速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传布,并以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季老的领导和带动下,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羨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可以看出,敦煌研究的繁荣时期,是近20年来,也恰恰是季老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时期,显然季老对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编撰敦煌研究文献

可以说,敦煌文化是季羨林先生毕生研究的课题。

1998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部由季羨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与出版工程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发起,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全书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其中彩色图片100余幅。内容涉及各个时代敦煌艺术的综述,几十个代表性洞窟的逐一介绍,关于敦煌文献的介绍等。全书以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及其编写的经过等,并将近几年来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在内。《敦煌学大辞典》是一部专业性大辞典,重要的词条注释字数往往超过千字,全书首个词条“敦煌”更长达1.4万字,而“敦煌学”一条系季羨林先生亲自执笔。书中还附有一批颇有价值的附录。敦煌学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敦煌学包含众多的学科。敦煌石窟艺术,举世闻名。

“《敦煌学大辞典》的编写和出版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研究成果和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生自1983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终身会长以来,为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悼念文中追忆了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事业中所做的杰出贡献。

2002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学研究丛书》,季老是该书的主编,该书从敦煌名称的含义入手,依次从史地、千佛洞、宝藏发掘与被盗情况、遗留文献谈起,直至阐述敦煌学的产生与发展。由12部专著和论文集组成,作者多为学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20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该书成为国家“十五”重点规划图书并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敦煌学研究丛书”的相继面世,使国内学者对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增强了信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也是季老终生从事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结晶。

五、留下散文杂记

季羨林先生曾经在《一生的远行——季羨林自选集》中收录描写了自己驱车进入敦煌时的文章——《在敦煌》,这已经成为季老珍贵的敦煌散文遗稿,可以说是作者的一手调查研究材料,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敦煌研究资料。“我在书里读到过敦煌,我听人谈到过敦煌,我也看过不知多少有关敦煌的绘画和照片。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一下子看在眼里,印在心中,我似乎有点怀疑,这是否是事实了。”这把季老初到敦煌的欣喜表露无遗。

进入洞窟后,季老用优美简单的语言,向我们呈现出了他眼中的敦煌壁画。“我们走进了洞子,尽管洞内洞外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雕塑,特别(下转第231页)

从疏密、虚实、穿插、躲藏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表现花鸟的远、近、前、后、虚、实、藏、露的空间关系手段,而且也是描写主题突出重点与非重点的布局方法。作品《孔雀》,采用传统的三面出纸构图法,孔雀与樱花之间的主从关系一目了然,孔雀作为主体的一个面,一朵朵樱花组合成团团的一个小面,枝杆作为线穿插于两个面之间,使面、线、面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使之“宾主呼应”,“顾盼有情”,“揖让有理”,樱花的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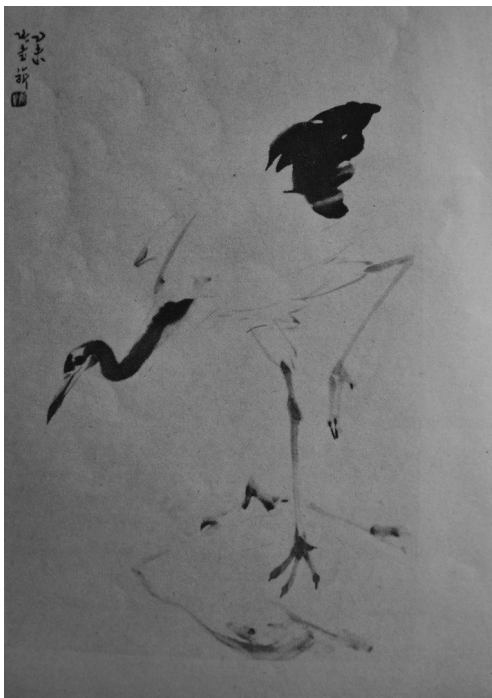


图4 《仙鹤图》



图5 《荷花翠鸟》

不散,密而不窒,达到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三面出纸传统构图的运用,让人有画外有画的感觉,体现了孔雀与樱花两物象的空间感和位置感。

其三 笔墨精到,设色优美。笔墨是中国画艺术语言最重要的根基,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中国画之艺术。张书旗先生用笔有紧有松,运笔遒劲俊健,有苍劲秀润用笔之称。张书旗笔下的这幅《孔雀》作品,其重墨劲笔刻画的孔雀造型,羽翅的利索用笔,脚爪用线的顿挫不经意中刻画出脚爪的结构,尾羽的线条勾勒,挺拔、劲秀、有骨有肉的行笔,充分体现出中国绘画的艺术语言。设色的浓淡清秀之分,充分体现了“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的效果,“用粉”则是张书旗先生绘画设色中最有个性的艺术,用粉调墨,用粉调各色去表现各种物象,并兼用墨之道的枯、湿、浓、淡之法表现物象,以求雅俗共赏,脱俗自然,清丽雅致,呼之欲出生动之姿。用粉点染花头,点染鸟禽头背翎毛,也善用粉蘸色点染花卉翎毛,其效果和表现力极为生动,形成色、粉与笔墨兼施的清新秀丽画风而独树一帜个人的艺术风格。

其四 主简去繁的艺术风格。张书旗一贯主张“主简去繁”,“简者”简于象,而非简于意。他曾画过一张仙鹤图,画面一只仙鹤俯首向下姿态,一脚站立在一石上,其鹤身和石都用简笔线条钩画,笔简意不简,艺术效果极佳。其实,画人都知道,笔简意不简作画难度最大,简笔中最见笔墨真功夫,稍有功力不足之人,即有破象露现出来。简笔还有另一层用意,即删去可有可无的东西,保留最精华的部分(图4)(图5)。他1941年所作《荷花翠鸟》作品,一朵白荷花,三小片卷着未开的荷叶,荷花梗上栖一翠鸟,四片水草。他删去了大片繁杂荷叶和拥簇水草,使主题突出,笔简意繁,以少寓多,用笔精到,游刃有余,清新耐看,笔简更显个人笔墨功力,也突出了画面的意境与韵味。

中国近代绘画史告诉我们,张书旗的“写生派花鸟画”和“用粉主义”的创新技法,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用这二种技法巧妙地将一些笔墨、设色技法串连在一起,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绘画艺术效果,创新出一种大胆用白粉设色的新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绘画艺术语言,作为反映自然界真实的情景和反映真实生活动态的“写生派艺术”是张书旗先生钻研一生的绘画艺术,形成了张书旗花鸟画派。而这种画派的花鸟画迎人、喜人、自然后继者代不乏人。

(上接第220)是看到墙上的壁画……在敦煌,在千佛洞,我就是看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废足的。有那样桃源仙境似的风光,有那样奇妙的壁画,有那样可敬的人,又有这样可爱的影子。现在就让我把自己的身躯带走,把心留在敦煌吧。”

“把心留在敦煌”这也是季老的一生对敦煌学研究的一个诠释,是一生心寄敦煌、关注敦煌、研究敦煌、发展敦煌学的最好写照。

“三冠加身何止五车富学教后人皆羨,千秋树范本为万斗高才看大木成林”。一幅幅挽联表达虔诚的尊敬和景仰,白花如雪倾注着无尽哀思。毋庸置疑,季老二十六年来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在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的理论、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编撰研究文献、留下散文杂记等方面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